

取消信访排名,让信访走向法治

据报道,多地信访系统官员向媒体记者确认:自今年3月至今,暂未收到国家信访局关于各省(市、区)“非正常上访”人次数的排名表。但是否将永久取消这一排名表,目前尚不知情。与此同时,有部分地方开始取消信访考核与排名。

有关部门是否永久停止“信访排名”的做法尚未可知,但“暂停”所透露出的信号,还是让人充满期待。就在几天前,中纪委相关官员也在媒体表态,“严禁到来访接待场所和公共场所拦截正常上访群众”。显然,要让截访绝迹,取消“上访排名”之类的做法,把上访纳入法治轨道,很有必要。

尽管很难说,一些地方对上访者实施“拦卡堵截”乃至黑截访、非法截访现象的原因,即在于这张信访排名表,但至少不能否认的是,在排名表压力之下,各地依上访数量对官员进行考核的做法,在客观上使得一些地方官在对待上访人员时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”。而当排名表藉以政绩考核之力,传导到每一个上访人员身上时,信访也就偏离了其制度设计的初衷。

必须让信访回归到它本来的样子。信访何谓?《信访条例》开宗明义,“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,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,维护信访秩序”。然而当属于民众的正当权利被以种种方式阻截,原本要用于保持政府与人民密切联系的信访制度,在实施时反而

成为阻隔这种联系、甚至成为制造新的矛盾的因素,就实在有必要反思问题的症结何在。从这个意义上,暂停信访排名,更像是一次从实务层面使信访制度回归初衷的探索。

不过,除了明确停止信访排名之外,现行上访制度还有很多需要得到廓清的地方。比如,“正常上访”与“非正常上访”二者定义不明的问题。由于概念模糊,“正常上访”的定义权时常被一些地方官员有意无意地滥用,将一些“正常上访”的行为定为“非正常上访”。那么到底是对它们重新界定,还是像一些学者所说,干脆取消“非正常上访”概念,值得认真考量。再如,关于“公共场所”的表述,严禁在“公共场所”拦截正常上访人员,是不是意味着“非公共场所”截访成为可接受的?

当然,从长远来看,使信访找回其制度设立的初衷,还是要使信访制度与公民救济最终实现法治化。这一法治化的目标,不光意味着信访工作应当依法行政,还在于最终以法治终结一种“信访不信法”的观念。

应当看到,在法治建设并不完备的历史阶段,信访是社会可以向公众提供了一种救济之道。但在用好信访渠道的同时,也要完善法治的渠道。让遇到问题的公民,能够使用法律武器,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。如此,既可以减少信访部门的压力,也可以让民众的权益救济,更有尊严、有效率地达成。 (转载自《新京报》)

因免费延收费属“国家请客,民众买单”

□ 马光远

日前,交通运输部公布了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(修正案征求意见稿)》(以下简称“意见稿”),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。从意见稿的内容来看,意在政府对还贷的收费公路以及经营性公路的收费行为,包括收费公路的范围、收费期限、收费标准、免费政策以及收费方式等进行规范,从而治理公路收费的种种乱象。

应该说,通过这些修改,一方面明确政府作为最重要修路主体以及以免费公路为主的原则,让公路逐渐回归真正的公共产品的功能;另一方面,通过界定收费标准以及严格规范收费期限,让收费公路不再成为各地的赚钱工具,从总体上降低中国的公路物流成本。

然而,意见稿却规定“国家实施免费政策给经营管理者合法收益造成影响的,可通过适当延长收费年限等方式予以补偿。”这个规定,不仅给收费公路的经营者随意延长收费期留下了制度的空子,更为荒唐的是,这将成为典型的“国家请客,民众买单”的案例。

其不可取之处在于:其一,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》在确定收费标准和收费期限时,就已经考虑到因军车等免费给经营者造成的影响,也就

是说,经营者的合理回报是根据各种因素包括免费政策等确定的。

其二,本次意见稿,在收费期限问题上,其实大多是延续以前的规定,而军车等的免费,也是长期以来的政策。以过去多年来高速公路的经营情况看,沪深两市已经上市的19家高速公路,多年来其总体毛利率都在50%以上,暴利情况远超房地产业,何来的影响其利益之说?

其三,如果因“免费政策”需要延长收费期,那前期的节假日免费的政策又成了什么?今天的免费,是为明天延长收费期埋下伏笔,而最终的结果可能是,免了10元,但因为收费期的延长,通行者付出的代价甚至是百元千元万元,这还算什么免费。

笔者认为,修改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》的初衷,应该是严格规范收费期和收费标准,治理多年来收费公路的种种乱象,通过控制经营者的收益率,改变公路暴利的本质,让公路真正成为微利或免费的公共产品,而不是变相的维持目前收费公路的暴利状况,更不是刻意维护公路经营者等的权益。应该通过制度设计,降低收费标准,参照美国、德国和日本等国核定高速公路收益率的方式,让公路回归公益,而不是继续找借口,维持收费公路暴利的现状。

“好借难还”呼吁公益转型

□ 杨朝清

广东深圳地铁集团日前透露,免费借给乘客使用的“红雨伞”遭遇好借难还的尴尬。一年来,共借给市民2000多把雨伞,只有70把还了回来。现在一些地铁站的“红雨伞”一把都没了。工作人员曾尝试着联系部分借伞人,却发现登记的电话号码常显示是空号。

在传统的道德话语里,“有借有还”的社会规范是一种美德;但规范仅仅在道德上有价值还不够,还必须在实际生活中有价值。换言之,如果一个规范只有道德价值而没有使用价值,那么,这种规范就不会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尊重与认同。这正是造成免费伞“借多还少”的关键。

一个好的规范,应该是道德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有机结合;只有这样,规范才能具备强烈的、持久的、普遍的行为感召力和激励力量。在一个陌生人社会,免费伞“有借有还”作为一种柔性规范,没有强制的约束力,再加上有假名字、假电话的“空子”可钻,“借多还少”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

有效地治理“借多还少”现象,不仅需要凝聚起老百姓对重建道德秩序和社会诚信的共识,也考验着社会管理者的智慧和能力。针对诚信缺失的社会现实,“红雨伞”公益活动主办方事先已经预料到“借多还少”的可能性,并采取了相应的应对举措——除了补齐丢了雨伞,还通过增加出租车投放力度、以抽奖方式鼓励人们还伞等途径,来消减“有借不还”。

社会诚信的道德回暖也好,城市文明和市民素质提升也罢,都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唤醒沉睡的良知,更多的时候要靠培育和鼓励,而不是抱怨与批评。就此来说,公益活动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补充,也要实现从“有没有”到“好不好”的转型升级,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,既扩大公益活动的覆盖面,也提高公益活动的质量。

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所言,不管一个制度设计得多么完善,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人,都会从中发现漏洞。而能够堵住这些“漏洞”的,除了个体的内部约束和行为自律外,也需要提高规范的使用价值和外部控制力。只有公益组织审慎操作、市民践行契约精神,免费伞才会“有借有还”。



□ 文/苑广阔 图/李宏宇

大学生谈恋爱,在公共场所卿卿我我不注意形象的现象在武昌职业学院已经沒有“生存空间”了。该校成立“校园巡逻队”,专门驱散这种不文明的学生情侣,此举引发争议。

大学生们把这支专门驱散不文明学生情侣的“校园巡逻队”戏称为“扫黄大队”,恰恰说明有些大学生的恋爱行为不够文明,有碍观瞻,让学校的其他师生在心理和情感上难以接受。对于这部分大学生,学校给予必要的引导和教育,既是对大学生要文明恋爱的提醒,也是对大学校园文明氛围的维护,并没有什么不妥。

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,对于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文明恋爱,什么样的行为算是不文明恋爱,既无科学标准,又无

准确定义,几乎全靠校方自己说了算,其主观性实在太大。如果标准太宽,起不到约束和引导的作用,如果标准太严,又有干涉大学生恋爱自由的嫌疑,容易引发争议和抵触。

而像现在这样,由学校成立所谓的“校园巡逻队”,对恋爱情侣直接“棒打鸳鸯”,一方面会让恋爱中的情侣在人数众多的“巡逻队”面前感到尴尬和难堪,另一方面,也会让他们在其他围观学生的面前感到难为情,进而产生反感和抵触心理,也就不是啥奇怪的事情了。

说到底,学生应该有文明恋爱的意识,但学校对学生的恋爱却不应该有“文明洁癖”,还是要以教育引导为主,而不是依靠蛮力去曝光,去制止,去让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丢脸丑。

标准是个大问题

□ 徐启峰

农夫山泉摊上大事了!从4月10日起,《京华时报》刊发《农夫山泉被指标准不如自来水》报道后,“有点甜”的农夫山泉就坐在了舆论的风头浪尖,期间虽然一直宣称品质高于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,一直和媒体对拍,猜疑竞争对手使绊子,唇枪舌剑,没个消停。劳动节刚过,北京勒令农夫山泉从商场下架,农夫山泉遭此重创,已然大败。

刚看到农夫山泉的“标准门”,相信许多消费者都是义愤填膺。这年头,从禽鱼肉蛋、鲜蔬干菜,到调味品、奶制品,冷不丁就有食品安全问题出现,每次都让人齿冷心寒。自来水被曝出“全国一半不合格”的消息后,瓶装水龙头企业又被指标准低下,喝水都出现信任危机,让国人情何以堪。

但是,如果把农夫山泉这桩事仔细看一看,你还真不能确定农夫山泉在质量上被人抓住把柄。它没被发现大肠杆菌,杂质超标,水质混浊……危机出现后,农夫山泉聘请美国国家测试实验室进行质检,结果是农夫山泉全面优于美国FDA瓶装饮用水质量标准,其中几十项更是优于十几乃至上千倍,总而言之,这水比美国矿泉水都好。美国的FDA是干什么的,大家不太清楚,但在关键时刻拿出的数据,想必是不会错的(如果能拿出样品的来源就更有说服力了)。拿到这些数据,农夫山泉在权威媒体重金买版,不仅以事实说话,还打出“人在做,天在看”的苦情牌,以期

扳回不利局面。但是产品质量再高,标准不过关,照样没戏。农夫山泉最大的问题在于执行的是浙江省标准,而非国家强制性标准——GB5749《生活饮用水标准》,而在其执行的地方标准中,多项污染物指标都宽松于国家标准,甚至不如自来水标准。就因这一条,农夫山泉败走京城,声名扫地。

就好像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,行业巨人傲骄地挥舞长刀,自认无懈可击,但对手却剑走偏锋,出其不意地戳在巨人“标准”软肋上,注意,是标准而不是质量,只一下,巨人长刀落地,败下阵来。农夫山泉自认有足以自傲的品质,为什么还要在地方标准的旧纸堆抱残守缺,难道以为:采用低标准,做出高品质就足够了吗?而在随后的反击行动中,农夫山泉始终回避其执行的产品标准是否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最关键、最核心的问题,而一再宣称“产品品质优于国家标准”。这种反击好似把大把的炮弹轰在无人区,效果可想而知。

就眼下而言,农夫山泉似乎更多地是输在标准上,而非质量上,和以前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相比,农夫山泉显得有点非典型,也有点冤。但是,在日益强调食品安全的今天,不拿标准当回事儿显然是不行的。在被首都下架后,农夫山泉称“遭遇舆论暴力,很受伤”,其实,对于农夫山泉来说,与其幽怨悲鸣,倒不如坦坦荡荡承认标准不够,向消费者承诺采用高标准。既然败在“标准”上,那么就从“标准”做起,真正做到高标准严要求,这样才是消费者欢迎的态度。